



历史学研究丛书

LISHIXUE YANJIU CONGSHU

赵宏著

# 中国陶瓷史学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赵宏著

---

# 中国陶瓷史学史

---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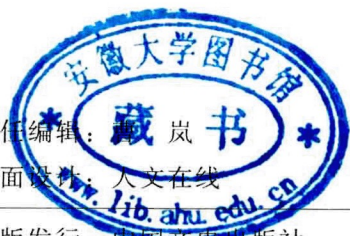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陶瓷史学史 / 赵宏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034 - 4395 - 4

I. ①中… II. ①赵… ①陶瓷—工艺美术史—史  
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6600 号



责任编辑：藏 岚 书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录 排：人文在线

印 装：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印 张：15.5 字数：262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导 语	1
第一章 先秦的史料	7
第二章 有关茶具的史料	10
第三章 前笔记时期——宋代文人笔记中的史料	19
第四章 元代蒋祈的《陶记》	29
第五章 后笔记时期	42
第六章 明代史志	59
第七章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与周高起的《阳羨茗壶系》	66
第八章 清代陶瓷史学	75
第九章 民国陶瓷史学	117
第十章 现在陶瓷考古史学	140
第十一章 现代陶瓷鉴定史学	168
第十二章 现代陶瓷文献史学	187
第十三章 现代陶瓷科学实验史学	193
第十四章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	216
第十五章 现代陶瓷外销瓷史学	228
附:综论中国陶瓷史学和史料学	234

# 导 语



史学史是历史上和近现代的人们遗留下来的对历史变化的记录和演变总结。在这些记录和总结中，过去的人们通过对史料和当时一些文献和事件的记载，表达了自己思想观念。而史学史的任务就是根据时代和个人的不同，区别载史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总结人们的载史方法，以使今后研究历史的人们以之为借鉴，充分地吸收过去的人们研究历史，思想观念，具体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过去的人们留给我们的史料是极其丰富的，这些史料包括文字记载，实物铭识、碑记雕塑、口头流传等等；同时还留下了同样丰富的历史著作。无论是史料还是历史著作，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实记录和思想观念，因而都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史学史研究应该在正确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采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以使研究深入而准确。

在我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无论是老一代史学家还是新一代史学家，对于史学史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研究。较为突出的史学史著作有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王树民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要》等。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他的《中国史学史》从传说时代的神话，到近代后期中的考据学派，跨时之长，涉及内容之丰富，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典范。王树民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要》，重在阐明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提纲挈领的概

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著作。作者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对中国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史学著作做了专门的评介，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陶瓷史学史领域，目前的研究尚属草创时期。从研究的现状上看，虽然偶然见到一些对陶瓷史名著的评介、注释、考证的实例，但目前尚没有一本较为系统的中国陶瓷史学史专著，这对于中国陶瓷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是，即使是些不很系统的评价、注释、考证，也是陶瓷史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至于其系统问题，我们可以参照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对其进行梳理和综合。

## 二

陶瓷史学史研究在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中是一个小领域，因此自身有其局限性。首先，陶瓷史学史中史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史料是记载史实的材料，陶瓷史学史中的史料无疑是记载陶瓷发展史实的材料。如笔记中的记事、诗歌、散文、奏折等等占了相当的比重。这种现象表明，历史上人们对陶瓷本身及其演变的重视，使它在文字表述中较为频繁地出现，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笔记、诗歌、散文、奏折这类文字记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笔记着力于把陶瓷作为一种珍奇的事物，把烧瓷活动视为不同一般的事务来加以渲染。诗歌和散文则是有感陶瓷作为一种艺术的特色，或以陶瓷代指一种其它的事务来加以发挥和引伸。奏折则直接记载烧瓷事务。这些记载对于史学来讲，还是较为原始的材料。其次，史料中杂就的现象较为突出。所谓杂就现象指的是有关陶瓷的记述不是以专门的形式，而是就存于记载其它事务的笔记和另外的文字里，它在这些笔记和文字中仅占很小的部分，或零星地出现。再次，传抄现象较为严重，许多观点，即使是很错误的观点，也世代相袭，同代相袭。甚至如“世云”这样根据传说来做结论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反映出材料运用的不严谨性。

鉴于陶瓷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们在进行陶瓷史学史研究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史学史的研究模式，来生搬硬套其研究方法，而是要根据陶瓷史学史研究的特点采用新的归类和研究方法，如此才能符合这一

领域的实际情况。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陶瓷史学史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其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进行脱胎换骨式的个性化。因此我们必须在总体规范和个性特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以使陶瓷史学史研究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恰当的支点。

因此，陶瓷史学史研究确切地讲是有关陶瓷记述、研究发展的历史。这一定位可以涵盖陶瓷史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又不会在总体上脱离史学史的研究规范。特别是有关陶瓷史料和陶瓷史学的关系问题，由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陶瓷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其需要做合适的安排。专门的陶瓷著作自不必说，而那些具有史料性质的材料，则作为陶瓷研究历史的上下传承的线索，将陶瓷研究历史的各个阶段串接起来。

### 三

在史学史的研究领域，有史实和史学之分。在陶瓷史学史的研究领域，由史实发展到史学经历了极为漫长的过程。先秦晚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奠基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确立了工艺观及其思想原则。《考工记》虽然是一部官书，但却反映的是普遍的工艺观念。其“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强调的是自然世界的客观因素及人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观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工艺发展影响较大。《考工记》涉及陶器，主要是说一些片断的现象；但由于陶器属于工艺的一种，因此书中所讲的工艺原则也同样涵盖陶器。

此后，陶瓷便陆续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有相当一段时间，文人有饮茶风尚，于是文人借咏瓷质茶具来赞美饮茶境界，因此陶瓷生产的发展被片断地记录下来。虽然其中渲染的成分较重，但也透现出一些史实，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史料的性质。

陶瓷作为工艺，并非是一种单纯的事物，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中唐时，隐逸文化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又兴盛起来，并且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中唐至宋代理学的出现，直到明清时期，隐逸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陶瓷的发展也



起到特殊的作用。理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文化形式。如鉴赏古物、文人画、笔记等。其中，鉴赏古物产生了中国陶瓷鉴定的最初行为，笔记则与陶瓷史学史研究有直接的联系。应该说，鉴赏古物和笔记的内容较为接近，所区别的是前者面对实物，后者是文字鉴赏。文人士大夫以笔记的形式赏物隐逸，陶瓷则是诸物之一。笔记赏瓷记载的是瓷器特点，也记载了瓷器生产和实用运作的情况。

同时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瓷器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瓷器在市场上的地位得意于隐逸文化的发展，官府和皇帝本人对瓷器的重视，它被赋予基本工艺以外的更为深刻的涵义。也由于此，制作瓷器的工艺技术的获得，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陶瓷发展的研究于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篇专论陶瓷的著作，这就是蒋祈的《陶记》。

此后陶瓷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由隐逸文化的鉴赏和商品经济及对工艺技术的要求这两种因素来支配。它们或分而发展，或结合在一起。

#### 四

陶瓷史学与总体史学相比，最初的发展具有某些随意性。在史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有史官，或称瞽史，他们记史虽然主要凭记忆和口传，但却可以给天子提供“教诲”，因而在传统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他们自己则也由统治机构所控制。陶瓷作为一种工艺最初在人们的眼里只有器用的概念。虽然有象《考工记》那样重视“百工”的文字，但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总脱不去“匠作”的风貌。而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文人才将其作为表达自己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趣的对象。因此说，早期的陶瓷史学是服务于士大夫的精神向往，是民间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内心的宣泄，并且与封建统治秩序相矛盾。

所以如此，是由于士大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与封建皇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特性。秦汉时期，中国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根本特点在于集权与专制。一个制度刚刚确立，往往过分强调自己的特点，秦汉时期专制体制尚不成熟，对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中介力量的士大夫压制过甚，造成了士大夫与皇权的严重分离，以至整个社会发生了解体，形成了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代时，封建统治者鉴于秦汉政体的不成熟，遂建立科举制度，使士大夫与封建政体融为一体，这样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从而使封建政体走向成熟，形成了盛唐的繁荣局面。然而中唐时，发生了“安史之乱”，封建政体和传统的文化体系面临着一次深刻的危机，士大夫与皇权又面临着又一次分离的威胁。

直到北宋时期，理学出现，才缓解了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理学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格物穷理”，即从实物上领悟到“天理”，即封建皇权的天赋之理。士大夫在“格物穷理”中沉迷于鉴赏古物，以追求隐逸闲适的精神境界；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政体趋向腐朽，传统文化的能量消耗过甚，士大夫“格物”却未必“穷理”，而是沉湎于对现实的实物的追求。而笔记则是士大夫表达闲情逸志的形式之一。这样，“格物”而格陶瓷之物，格物则以笔记的形式鉴赏，于是形成了早期陶瓷史学的特征。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遂使作为它的一种补充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陶瓷作为一种商品被投放市场，引起人们对陶瓷生产技术的追求，从而展开了陶瓷史学的另一面。宋代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元代的海外贸易较为发达，更有明代中晚期和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高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异化倾向不仅对中国陶瓷的总体发展，而且对中国陶瓷鉴定的发展，中国仿古瓷的发展，中国陶瓷史学史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这种发展趋向，中国陶瓷史学史的分期为：

草创期（战国、唐、宋、元）

以元代蒋祈《陶记》的出现为这一时期的结束。包括早期的零星记载，中唐诗人的闲情，宋人笔记。由于笔记形式在中国陶瓷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历时较长，作用重要，因而将蒋祈《陶记》出现之前的笔记发展称为“前笔记时期”，而将其后的笔记称为“后笔记时期”。

成熟期（明清）

以明代末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清代前期的《陶说》及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为代表。明清时期，笔记仍然较为盛行，从明初直到清代，成为贯穿陶瓷史学的线索，因而称之为“后笔记时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虽然不属于陶瓷专著，但它反映了当时新的工艺观，故专门列出。《陶说》和《景德镇陶录》则属于综合的陶瓷专著，反映了古代陶瓷史学的成熟。此外，明清时期有关陶瓷生产的史志较为丰富，唐英的诗文和奏折也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陶瓷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民国陶瓷史学是古代陶瓷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杨嘯谷的《古月轩瓷考》、辛安潮和吴仁静的《中国陶瓷史》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

#### 高峰期（现代）

现代的陶瓷史学可谓是云蒸霞蔚，异彩纷呈。出现了陶瓷考古史学、陶瓷鉴定史学、陶瓷科学实验史学、陶瓷艺术史学、陶瓷外销史学、陶瓷文献史学等诸家流派。这些陶瓷史学流派借鉴西方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成果，各辟蹊径，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中国陶瓷的发展规律，使中国陶瓷的发展更为清晰地显示出它的本质特征。

# 第一章 先秦的史料

先秦晚期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走向崩溃的时期，也是孕育着新的社会制度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一般来说，诸子百家的争鸣主要是探讨富国强兵，治理国家，建立新的人生观的思想，许多思想在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以治理国家根本手段。然而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肥沃的学术土壤不仅产生了新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治理国家的明鉴，人生观念，而且产生了新的科学和工艺思想，这以《墨子》和《考工记》为代表。《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子及其学派思想的著作，其中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等观点，在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与儒家学派的思想相抵触，不符合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利益，因而秦汉以后便衰微。《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为战国初年齐国的官书。书中记述的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工种，很适应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流传，其中的许多工艺原则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着指导地位。

《考工记》卷下对当时的陶器制作有所记载。虽然这种记载后人看来似乎过于简单了些，但就当时来说，却是对陶器制作的最详细的载述。其中说：“陶人为甗，实二鬲，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鬲，厚半寸，唇寸。甗，实二鬲，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穀，厚半寸，唇寸。庚实二穀，厚半寸，唇寸。旒人为簋，实一穀，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穀，崇尺。凡陶旒之事，髻悬薛暴不入市。器中脰，豆中县。脰崇四尺，方四寸。”<sup>①</sup>

---

<sup>①</sup> 先秦《考工记》，闻人军译著《〈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处记载当时陶器的一些主要形制甗、盆、甑、鬲、庚、簋、豆的特点，器物须合乎要求，否则将不能进入官市贸易，表明当时制陶工艺的精良程度虽然不能与后来的工艺相比，却也要求十分严格。其中一些器物与青铜器拥有同样的形制，反映出青铜器对陶器的影响。

从记载中可知。当时的制陶人有两种：一种叫陶人，另一种叫旒人。从字面意义上看，两种制陶人分制不同的陶器，为当时制陶事务中的两种专司人员。但其本身的含义却并非如此简单。从“凡陶旒之事，髻垦薜暴不入世。”上看，旒人所制陶器为当时为当初陶器中的上品，制作规格高且较为严格，应是当时上等人使用的器物。而陶人所制陶器则是普遍使用的器物。即使制作上有一些毛病也不会被淘汰。

《考工记》卷首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又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舟，此皆圣人之作也。”从当时一般的原则来看，陶人和旒人属于百工之列，而百工之作可比圣人。从历史来看，这只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从作者的角度为其所涉猎的领域罩以溢美之词，然而当时工匠的地位较高却是较为显明的。

然而此后随着陶器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瓷器。“陶”说又有了新的涵义。百工在封建社会里却长期被认为是下等职业，这与封建体制下社会倚重士大夫不无关系。

然而《考工记》中对于包括制陶工艺在内的工艺的总原则，却被完全继承下来。《考工记》卷上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意为利用天时和地气，选择好的材料，进行精巧的工艺雕琢，这样就可以得到精良的器物。这一总的原则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陶瓷发展的历程中，并且于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考工记》中记载的百工，是与士大夫相提并论的。从对百工所放溢美之词看，当时的士大夫也占据较高的地位。实际上，士大夫所谓的地位较高在当时也就是靠领俸禄而生，依附于诸侯的知识阶层。在各个诸侯国中，士人对于权贵的依附关系可以反映出以下几点：首先，士人与权贵的地位不同，两者之间有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士人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其次，利益不同，士人通过向权贵贡献知识智慧来保全自己，因而他们需要的是庇护；而权贵则需要士人的知识从事政治活动。再次，立场不同，士人向权贵

提供知识和智慧，自己并不负有政治责任，因而天然具有自由，独立的特点；而权贵则负有政治责任和权力，需要包括士人在内的所有阶层都对自己取服从的态度。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尚未形成权贵对士人的绝对制约的条件，士人既可以为这个权贵服务，又可以为另一个权贵服务，既可以在一个诸侯国里服务，又可以在另一个诸侯国里服务。

## 第二章 有关茶具的史料

秦国吞六国而定天下，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将先秦时一个诸侯国的统治秩序放大到整个国家，士人便开始失去了以往的自由。

中国的封建集权制度，把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各种因素都全面地，自始至终地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演变为封建社会重要阶层的士大夫，便没有多少自由的余地了。于是，皇权的绝对控制与士大夫自由的要求之间，便产生尖锐的矛盾。

然而在封建社会的集权制度下，皇权对于士大夫又具有依赖性。首先，士大夫作为知识阶层，在先秦时就具有向统治者输送统治思想的功能。士大夫博古通今，知识丰富，可以为统治者输送政治经验和智慧。其次，在整个封建关系中，士大夫可以上接封建统治者，下连普通的黎民百姓，处于封建体制的中间阶层，失去了士大夫，也就破坏了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体制的崩溃。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皇权若想保证封建体制的完整和封建制度的延续，就必须拉住士大夫阶层，使之为皇权服务，并且要正确地处理士大夫的自由问题，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而以不脱离皇权的控制为前提，这样，士大夫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士大夫对皇权具有依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士大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士大夫又要求自身的自由和独立性，这样它就要在森严的封建秩序中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在不与皇权发生冲突的条件下，体现这种独立性和自由。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开始。前面提到，大凡一种事物出现之初，往往总要过分强调自身特点的重要性。秦王朝过分强调专制，集权，统一的特点，对士大夫的压制甚为严酷，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惨剧，所有的文人，便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李斯。这反映出秦王朝作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在一定程度上仅具有中国封建制度的初创之功，却远非成熟，反而将士大夫与皇权的固有矛盾暴露无余。

汉代初建，鉴于秦王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的破坏，实行修养生息之策，出现了百家思想复兴的局面。一时间，儒、道、法等家思想盛行。然而随着王朝的延续，列侯的势力又开始抬头，甚至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尤其是列侯的养士之风盛行。士大夫依附各个诸侯王，并为其反汉出谋划策。面对这一局面，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对王国的削弱，利用“附益法”限制士大夫与诸王交游。此外汉武帝还实行了许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诸如加强中央的军力，严厉刑法、统一货币……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吸收了阴阳家和法家思想，神化君权，加强刑法。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无疑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打击了动摇封建体制的王国势力，使中国专制政权的格局基本确立；但同时，也加深了士大夫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士大夫与豪强地主结合，形成士族门阀，并促使西汉王朝的覆灭，建立了东汉政权。然而，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却没有根本地解决，士大夫与皇权的离心力越来越强。

从历史的角度看，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封建体制得以初步确立；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封建社会中专制的一面，并且这一面又控制在外戚和宦官的手里，便出现了专制而腐败，控制而无力的局面，使士大夫看不见皇权有任何光明的前景，遂转向了大地主势力，从而形成了与皇权的强大的离心力，并逐渐脱离了皇权的制约。这说明封建制度虽然开始完备，但是并不成熟。如此的趋向终于导致社会的解体，中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

残酷的政治斗争，飘渺的政治理想，使士大夫为寻找自身的精神出路而殚思竭虑，于是隐逸文化便兴盛起来。东方朔提出的“避世于朝廷间”是隐逸文化的一般形态，而“竹林七贤”避世于竹林之间，则是隐逸文化的极致和典范。这些都反映出士大夫对集权制度的否定和反叛，反映出封建社会本身所固有的深刻危机和异化倾向。然而士大夫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根本地脱离封建统治的制约的。象竹林七贤那样完全独立，狂放不羁的表现只能成为一种极致，而不可能普遍而经常地存在。因此，隐逸文化最经常地体现在“避世于朝廷间”和一般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体现绝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出世方法，而应被看作（事实上也正是）一种人生观念，一种精神出



路，一种人格完善。隐逸文化的表现形式很多，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表现时间较长，形式较为鲜明的是饮茶。

饮茶之于隐逸文化的作用，《全唐诗》中皎然的诗作了最好的注解。他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被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珍，惟有丹丘得如此。”<sup>①</sup>

一种生活习俗寄托了士大夫关于昏冥避乱，而情神清爽自得的人生态度，通过这种人生态度，他们可以达到道玄飘渺而崇高的境界。因此若行走于朝廷间，一旦饮茶，便可以完全摆脱险恶的争斗的境遇和腐败的情景，达到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即现实当中的相对独立性。

士大夫饮茶总喜欢赞美茶具。因为饮茶并非仅仅品味茶叶的味道，而且还欣赏茶具，并且与饮茶相映成趣。

东晋时，杜预写有《菴赋》，对茶叶的栽培、饮用和茶具进行吟咏：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菴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修，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则陶炼，出自东瓯，酌以匏，取式公刘，惟滋初成。沫陈华浮，焕如积雪，晔如春敷。”<sup>②</sup>

杜预，又作“杜毓”（222—284），司马懿之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率军伐吴，统一中国，著有《春秋左式经传集解》。

对饮茶、茶叶、茶具的吟咏，本是追求一种隐逸的玄妙境界，而不是从瓷器专业的角度来介绍瓷茶具，然而这种吟咏却给我们提供了早期瓷器发展的史料。菴，茶也，菴赋，即茶赋。此段史料运用当时流行的赋体，简洁明快，富于韵致。

此赋收于唐代的《艺文类聚》，同时亦见于陆羽的《茶经》，后世清代朱琰的《陶说》和兰浦著、郑廷桂补辑的《景德镇陶录》及民国时的《瓷史》等。现代学者陈锡仁和熊寥先生对赋中“器则陶炼，出自东瓯”进行了有益的争论。

“器则陶炼，出自东瓯”是此赋中涉及瓷器的唯一一处，它讲的是茶具的生产地点，即生产茶具的瓷窑。饮茶是士大夫精神和人格理想的体现，而对茶具的选择，不仅仅是茶具的制作精良，或者是美观的问题，而是器物的

① 皎然《饮茶歌请崔石使君》《全唐诗》卷821。

② 晋代杜毓《菴赋》选自熊寥《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形成和色调与饮茶的情境相结合的问题。东瓯窑，清代朱琰《陶说》中说“杜预《舜赋》云器择陶拣，当时亦不止一窑，此乃其精焉者耳。瓯亦越地，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sup>①</sup> 兰浦《景德镇陶录》中说：“瓯，越地也，昔属闽地，今为浙之温州府，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sup>②</sup>

这两部著名的陶瓷史专著从记载茶叶的文献中挖掘陶瓷史料，表现出探求陶瓷历史发展的坚韧。然而两者对东瓯窑的表述却不尽相同，前者为“瓯亦越也，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后者为“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之温州府。”前者至少点明东瓯窑先于越窑而知名，后者则较为含糊。

东瓯窑或称瓯窑的确与越窑同在浙江，但由于地处温州，又称温州窑，因而与越窑分属不同的地理区域。

瓯窑瓷器胎质细腻，釉呈淡青色，透明度较高，称“缥瓷”，是浙江省境内仅次于越窑的瓷窑。然而瓯窑的闻名，无非晋代的“缥瓷”。作为茶具，其釉色如缥这种织物，想必可以使文人产生宁静、悠远的联想。

由此可见，作为陶瓷史学史的萌芽，上述史料并非是因对陶瓷本身的发展的重视而产生，而是出于士大夫隐逸文化的精神追求。

隋朝全国实现了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的局面，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又重新全面地实行。隋统治者对封建体制建立以来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总结，痛感皇权与士大夫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危害，遂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隋代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封建统治的机构中去，从而被有机地纳入皇权意志下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去。经过长期的探索、实验，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到了唐代，封建统治终于较为有效地理顺了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成熟，并且籍此形成了唐代社会的繁荣景象。唐代时，封建体制所形成的一套管理秩序，如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能够较为从容地驾驭着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然而一种制度实行日久，其弊端就渐渐暴露出来。由于唐代实行开放，兼容的统治政策，因而对各地的控制相对宽松；然而当封建统治的手段因时间的延续而变得僵化而缺乏应变能力的时候，宽松就意味着失去控制，以至于地方势力增强，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最后开始威胁到中央的统治。中唐

<sup>①</sup> 清代朱琰《陶说》卷四《说器上》，傅振伦《〈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

<sup>②</sup> 清代兰浦《景德镇陶录》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